凌稚隆《史记评林》探析

朱志先

摘要：凌稚隆是明代万历时贡生，嗜好《史记》，他汇集万历四年以前历代研究《史记》的优秀成果，撰成《史记评林》。此书并非明代的一些摘抄、评点本可比，它不仅收录了历代研究《史记》的精华，且其间亦渗透着凌氏的真知灼见。此书为后世研究《史记》在内容、体例和版本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，因此，不能因其名为《评林》，就否定凌稚隆研究《史记》的成就以及《史记评林》的史学价值。

关键词：凌稚隆；《史记评林》；《史记》研究

中图分类号：K204.2 **文献标识码**：A **文章编号**：1009-1017(2009)04-0089-05

《史记评林》是一部汇集万历四年以前《史记》研究成果的荟萃之作①，它的产生既有历史的机遇，也和凌稚隆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。

明代正德到隆庆时期掀起一股习《史》、《汉》的热潮，其间《史记》被刊刻的版本有8种，《汉书》被刊刻的版本有6种，《后汉书》被刊刻的版本有4种，这其中大部分属于民间刻坊所为②。嘉靖一朝官刻的《史记》有5种，对汉史进行研究的著作有20多种③。说明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对汉代史著都颇有兴趣，否则不会在同时期出现这么多汉史著的刊刻本。另一方面，也暗示了当时存在着需要汉史著的市场，在此情况下，《史记》研究的荟萃之作——《史记评林》便应运而生。

凌稚隆字以栋，号磊泉，浙江乌程人，万历时贡生④，其“承先世家学，笃于典故，所辑有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评林、《左传评注测义》、《五车韵瑞》等书行世”⑤。凌稚隆先辈对《史记》已有一定的涉猎，这使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其父亲凌约言著有《史记抄》，凌稚隆对此进行潜心研究，感到《史记抄》不太完备，便遍搜群籍，力图编纂一部较为完善的《史记》研究著作。另外，对《史记》颇下功夫的凌迪知、金学曾、张之象也常拿自己研治《史记》的著作，与凌稚隆所评《史记》互相对照和研讨。凌稚隆最终从1574年到1576年汇总众多史家评《史记》之珍本，撰成一部《史记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⑥。目前学界对《史记评林》的研究还比较少，基本上处于介绍层面，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。鉴于此，笔者从《史记评林》的内容及撰写方法入手，探析凌稚隆对《史记》研究的成就与贡献。

一、《史记评林》内容及撰写方法

凌稚隆历经两年的辛苦整理与撰辑，终于完成一部巨著《史记评林》，此书在内容、体例、版本以及撰写方法方面都有很大突破。

1、内容上的广博

首先，《史记评林》不但搜集了历代对《史记》进行点评的专著，而且汇集了一些单篇名作⑦。以明

①目前相关研究成果：贺次君在《史记书录》中主要从版本学的角度对《史记评林》进行研究（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，第 160-170 页）；覃启勋在《史记与日本文化》一书中介绍了《史记评林》对日本《史记》研究的影响（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）；钱茂伟在《明代史学编年考》中只节选了《史记评林》的一个序（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年版）；张新科、俞樟华在其书中对《史记评林》进行了简单介绍。（《史记学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，第 126-127 页；《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》，华文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166-167 页）

②据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目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；北京图书馆编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；清华大学图书馆编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。

③据周弘祖编《古今书刻》整理。

④《续文献通考》卷 154，《经籍考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⑤《浙江通志》卷 179，《人物六·文苑二》。

⑥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，第 1 册，第 124-125 页。（明）凌稚隆辑校，（明）李光缙增补《史记评林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。以下引自《史记评林》只标明册数及页数。

⑦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：“太史公《史记》批评古今已刻者，

收稿日期：2008-11-30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咸宁学院博士专项基金项目。项目编号：DK0705
作者简介：朱志先（1976-），河南南阳人，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，历史学博士，从事文化史与史学史研究。

代为例，就有王鏊、何孟春、王韦、杨慎、许应元、王慎中、柯维骐、凌约言、董份、茅坤等人对《史记》所载史实作的评论和考证。并且对散见于各个名家文集中的有关对《史记》的评点之作进行了汇总①。其次，历代专治《史记》者颇多，为研究《史记》著作撰写的序也很多，通过作品的序，可以了解历代研究《史记》的状况及其演变，凌氏搜罗了大量有关《史记》研究著作的序，并汇集在一起，以利后世研究者借鉴②。再者，《史记》中一些史事是引自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世本》等书，作者认为史事叙述不是很详尽的，便把所引全文附于眉首之处。对于有助《史记》相互考证之书，如《风俗通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等书，“择其切要者录之于上以备考证，亦名曰按云；篇中纲领节目关键诸家未评者，兹僭揭于上，亦曰按云”③。对于旧本中一些篇章割裂，内容不一致的地方，为便于观览，作者把其归为一篇④。

2、体例上的严谨

首先，正文的前面列有《史记评林》中所引用作者的简介及其相应的参考书籍，类似于现在著作后面的参考文献，比较符合学术规范。其次，《史记评林》的编排，是根据《史记》篇章的顺序，正文部分是《史记》的内容，并且保留了《史记》的原有风貌，而相应研究内容，则置于对应史事所在页面的眉首，或者在一篇的末尾加以佐评。不像其他一些评点本，只是把《史记》的内容进行概括性罗列，然后加以评点。《史记评林》的这种体例，使研究者可以有的放矢地参阅其中的评点内容，不必再去逐个比对《史记》原文，因为在同一页面中即可弄清评点者所依据的史料。第三，《史记评林》借鉴了苏辙《古史赞》、吕祖谦《十七史详节》的编写方法，且作者认为苏轼精于郡邑之沿革，因此把秦汉时的帝王侯世系图和地理变迁图附于著作之前，以便后世学人进行参考⑤。

3、《史记》版本选择上的慎重

研究《史记》时，所参照版本质量的优劣，直接会影响到研究的质量。因为史料的载体已有不确，那么研究者所进行的探究便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，所得结论自然经不起推敲。凌稚隆在对《史记》进行研究时，非常注意《史记》版本的选择，选用最好的宋本和汪本为底本，并且把不同版本进行相互校对，以免出现错漏之处⑥。对于自己不确定之处，凌稚隆采取存疑的方法，以最好的底本为参考，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内容批注与旁，但仍保留原来的说法⑦。可见凌氏作学问非常严谨，并非后世所谓明人皆肆意之谈，无所可取。

二、凌稚隆与《史记》研究

《史记评林》是历代研究《史记》的集大成者。从《史记评林》的内容便可了解到凌稚隆对《史记》研究的贡献。凌氏此作，汇编历代研究《史记》的精华，在当时影响颇大，以致有些《史记》研究者以自己的成果未被收录而感到遗憾⑧。甚至“自《史记评林》成，而学士大夫好其书者，麇集于际叔（凌稚隆）之门。”⑨《史记评林》不仅汇集历来研究之成果，而且“凌氏（稚隆）除了集各家之说外，许多地方还有自己的评论，且能启人耳目”⑩，可谓自成一家之言[11]。

凌稚隆对《史记》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：

1、对《史记》风格的评点

惟倪文节《史汉异同》、杨升庵《史记题评》、唐荆川《史记批选》、柯希齐《史记考要》。其抄录流传者，何燕泉、王槐野、董浔阳、茅鹿门数家。若杨铁崖、王守溪、陈石亭、茅见沧、田豫阳、归震川数十家则又搜罗而出之，悉选录入，兹刻更阅百氏之书，如《史通》、《史要》、《史钺》、《史义》、《唐宋确论》、《史纲辨疑》、《黄东考日抄》、《丘琼山世史正纲》、《日格子学史》之类。凡有考明《史记》者各视本文标揭其上，间有总论一篇大旨者，录于篇之首尾，事提其要，文钩其玄，庶其大备耳”。（第 1 册，第 119 页）

①“读史总评”引有以下人对《史记》的点评：郑樵、晁无咎、苏洵、苏辙、叶盛、李清臣、吕祖谦、黄震、李塗、秦观、林駉、黄履翁、鲁鞏、范祖禹、王应麟、马端临、刘因、马子才、陈传良、洪迈、王懋、王鏊、郑一鹏、黄佐、王祎、何乔新、王维桢、何孟春、凌约言、茅坤、王世贞、陈文烛、卢舜治，最后附有王世贞的《长短说》。（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1 册，第 145-185 页）

②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1 册，第 33-87 页。

③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，第 1 册，第 120 页。

④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有云：“五帝等纪、酷吏等传，虽数人同叙其血脉联络，本为一篇。旧本割裂分题，殊失本旨，兹仍合之，各自为起，又始皇等纪以岁次起，历律等书以象纬起，皆以便观览也”。（第 1 册，第 123 页）

⑤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，第 1 册，第 122 页。

⑥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称：“《史记》刻本自宋元迄今不下数十家，但近时见行者杭本无《索隐述赞》，白鹿本无《正义》，陕西本缺《封禅》、《河渠》、《平准》三书，惟金台汪本、蒲田柯氏所校颇少差谬，兹刻以宋本与汪本字字详对，间有不合者，又以他善本参之，反复雠校，庶免亥豕鱼鲁之弊云。”（第 1 册，第 124 页）

⑦《史记评林·凡例》，第 1 册，第 121 页。

⑧李光縉指出：“盖自《史记评林》行龙门子，盖藉是赫寰中矣……读凌自评断曰白雪阳春，维寡和矣。顾又闻徐龙湾叙史评，以凌不及录其评为恨。”（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1 册，第 126 页）

⑨王世贞《弇州续稿》卷 44，《汉书评林·序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 1282 册，第 574 页

⑩张新科《史记学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 2003 年，第 126-127 页。

11 王世贞在《史记纂·序》中言：“若夫籍而成一代言，则有初梓之《评林》（《史记评林》）在。”（《弇州续稿》卷 42，《史记纂·序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 1282 册，第 560 页）

指出《史记》具有寓论于叙和微言大义的风格。凌稚隆指出，太史公对秦汉史事的议论，并不都是直抒其观点，有时是用特定书法以表达自己的倾向。对于太史公在行文中揭露秦的暴行，凌稚隆指出："按太史公纪秦斩首之数，凡 11 处，以秦之尚首功也。不言其暴，而其暴见。"[①]对于《史记》书众大臣劝谏文帝即皇位，连用四个"宜"字等词汇，凌稚隆也揭示道："按太史公连下'宜'字、'计'字，则诸大臣之慎重，代王之谦让具见之矣。"[②]汉武帝迷恋于神仙方士之说，隆"按自武帝有求仙之惑，今日用方士，明日遣祠官，溺志于□诞之说，而不自知。故子长作《封禅书》以救其失，虽曰：'帝王何尝不封禅'，而其赞乃曰'究观方士祠官之意'，子长之意婉矣。"[③]凌稚隆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"按此书直书其事，而其失自见，有讽意无贬辞，可为作史纪时事者之法。"[④]凌氏认为太史公用心颇为良苦，为使汉武帝明白沉湎于方士之术的害处，但又不能直接表于字面，只有通过《封禅书》来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对于《史记》揭露汉武帝四处征伐之弊的书法，凌稚隆断道："自武帝有征利之欲，今日禁盐铁，明日置平准，留意于锥刀之利，而不自知。子长欲箴其失，故作《平准》一书，往往指言弘羊致利之由，子长之意深矣。"[⑤]通过对桑弘羊的描写，来衬托汉武帝之多欲。为显示对匈奴作战的利害关系，隆"按自篇首至此将历叙匈奴强盛必先曰，'三百有余岁'，'百有余岁'者凡八书，始著匈奴侵盗，暴虐中国。又必曰，'百有余年'，'百有余年'始著昭王筑长城以拒胡。而后总结之曰'自渟维以至头曼，千有余岁，见其传世，益又流毒益深。'是太史公叙事针线处。"[⑥]由此可见，凌氏对太史公寓论于叙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的分析是很到位的。

认为《史记》具有史笔缜密的风格。凌稚隆认为太史公在叙述事件时非常严谨。对于《楚世家》中的缜密处，凌稚隆"按：前既叙其王，五子相篡弑矣，此复追叙其王请神决立一段，与叔向论子比一段，首尾俱用'初'字、'如'字，盖总收上文以见乎王之立不偶然也。"[⑦]他认为太史公叙事首尾照应，颇为严整。对于《商君列传》中的叙事手法，凌稚隆"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学，则鞅所以说君而君说者，刑名也。故通篇以'法'字作骨。曰鞅欲变法，曰卒定变法之令，曰于是太子犯法，曰将法太子而终之，嗟乎，为法之敝，一至此。血脉何等贯串。"[⑧]对《高祖本纪》的描述，茅坤曰："读《高祖纪》须参《项羽纪》，两相得失处，一一入手。"[⑨]凌稚隆进而指出，"按篇首高祖追称之也，及叙其始事，则称刘季；及得沛，则称沛公；及王汉，则称汉王；及即皇帝位，则称上。此太史公用意缜密处。"[⑩]

指出《史记》具有简洁而曲折的叙事风格。凌稚隆认为太史公在叙事时不仅能简洁得当，而且还能通过曲折的描述来展现事件的原貌。太史公对张叔治狱仁厚的描写较为简洁，[11]凌稚隆指出："张叔涕泣封狱，知其性本仁恕，所以虽治刑名，而不入也。篇中称长者凡三，太史公之文短简而多曲折者，殆此类欤！"[12]太史公用 121 个字，用了 3 个"长者"，便把张叔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凌氏认为太史公叙事短简而有曲折。

揭示《史记》互见法的叙事风格。有关范蠡的描述，何良俊曾评论道："范蠡列任《货殖传》，本传只载货殖事，若伯越诸谋昼典越事相联者，则附见《越世家》中，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。"[13]凌稚隆则曰："太史公曲范蠡于《货殖传》，而功名则附之《越世家》。苏子由撷之《世家》，参之《吴越春秋》作《钟蠡传》，补史迁之不及矣。"[14]同样，对于"建元中，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，（韩）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。蚡言安国太后……（王）恢私行千金丞相（田）蚡，（田）蚡不敢言上，而言于太后曰：'王恢首造马邑事，今不成而诛恢，是为匈奴报仇也。'"[15]隆"按：两受金，两言太后，蚡之宠赂章章也，太史公不载之《蚡传》，而载之《安国传》。即于《张汤传》见弘羊之意云。"[16]

2、对《史记》所载史事的评论

通过史事辨析，借以了解历史之真相。对于刘邦"遂为义帝发丧，临三日，发使者告诸侯曰：'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，大逆无道，寡人亲为发丧。'"邵经邦认为刘邦此举展现其大义[17]。霍韬认为汉祖有孔子仁爱之遗风[18]。凌稚隆则认为"汉王袒而大哭，特借此以激怒天下，非真哀痛之也，不然何入关之谕止曰：'吾与诸侯约，不曰义帝约乎。'要知项羽不杀义帝，汉王岂

①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1 册，卷 5，《秦本纪》，第 308 页。
②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2 册，卷 10，《孝文本纪》，第 193 页。
③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3 册，卷 28，《封禅书》，第 629-630 页。
④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3 册，卷 28，《封禅书》，第 535 页。
⑤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3 册，卷 30，《平准书》，第 651 页。
⑥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6 册，卷 110，《匈奴列传》，第 298-299 页。
⑦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4 册，卷 40，《楚世家》，第 151 页。
⑧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5 册，卷 68，《商君列传》，第 95 页。
⑨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2 册，卷 8，《高祖本纪》，第 75 页。
⑩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2 册，卷 8，《高祖本纪》，第 75 页。
11《史记》卷 103，《万石张叔列传》。
12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6 册，卷 103，《万石张叔列传》，第 102 页。
13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4 册，卷 41，《越世家》，第 222 页。
14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4 册，卷 41，《越世家》，第 219 页。
15《史记》卷 108，《韩长孺列传》。
16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6 册，卷 108，《韩长孺列传》，第 253 页。
17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2 册，卷 8，《高祖本纪》，第 118 页。
18《史记评林》，第 2 册，卷 8，《高祖本纪》，第 118 页。

能出义帝下者。项羽特为汉驱除耳”[①]。汪越亦称：“高帝约法三章及为义帝发丧，是灭秦破楚之本，不书何也？约法在未为汉王前，已见月表发丧非其本意。凌以栋（稚隆）云不过假羽失著，迫取天下耳，观异日置秦皇楚卫齐赵冢田横亦为改葬，何独于义帝寥寥耶？”[②]可见，汉王此举并非真大义，而是借此捞取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资本。

以国家兴亡为大义评论史事。对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，陈平、周勃无所谏，凌稚隆按“陈平、周勃不以此时极谏而顾阿谀屈从，延致酿成其祸，他日虽有安刘之功，仅足以赎今之罪耳。故曰：人臣之义，当以王陵为正”[③]。对张骞出使西域，凌稚隆认为汉武帝君臣不顾国家兴衰，“总来只一‘贪’字为累，便贻国家无穷之戚如是”[④]。

从文风上来辨析《史记》之所载。关于汉武帝伐匈奴一事，《史记》记主父偃从秦始皇不听李斯的劝阻派蒙恬伐匈奴，导致天下叛乱；汉高帝不听成进的劝谏，亲自伐匈奴，导致平城之围。进而讲述周代成康之隆的原因，向汉武帝劝谏勿伐匈奴[⑤]。对此段叙述，凌约言评曰：“言伐匈奴利害如指掌，秦皇、汉武二事足以鉴矣，文字温淳厚重质实，愈嚼而愈有味。是汉初元气复还之作，非战国元气浇漓之余习也。”[⑥]凌稚隆进而从文风上分析：“此书先引秦伐匈奴，而以天下始畔结之，继引汉伐匈奴，而以高帝悔甚结之，即上好战必亡，与务战胜穷武事，未有不悔意。然只泛论，未曾见得今日事体，故又申言秦失之当戒，及虞夏殷周之可法，复明辨以深儆之。其文温淳厚重，信非汉人，道不到此。[⑦]”

3、对《史记》所载史事的考辨

《史记》中云“独沛公素宽大长者，可遣。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西略地，收陈王、项梁散卒。乃道砀至成阳，与杠里秦军夹壁，破（魏、秦）二军。楚军出兵击王离，大破之。”[⑧]而《汉书》则为“（秦三年）初……乃遣沛公西收陈王、项梁散卒。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，攻秦军壁，破其二军……十二月……羽打破秦军巨鹿下，虏王离……（秦四年）二月，沛公从砀北攻昌邑，遇彭越。”[⑨]通过比较，凌稚隆认为：“沛公西入关道砀，当是时，与羽分道，令杂楚军出兵于秦军，破二军之下，则疑于楚汉与彭越俱攻秦矣。此太史公失考前后处，《汉书》补年月别之良是。”[⑩]即《史记》对此事的记载比较模糊，使人易产生歧义，不如《汉书》的记载明确。同样，通过比较《战国策》[11]和《史记》[12]中有关孟尝君与冯驩交往的记载，可以洞悉《史记》记载之正误，因为《战国策》对此事的记载要早于《史记》，并且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时，有关战国时期的资料大部分是源于《战国策》。因此凌稚隆指出：“《国策》‘无以为家’下云，‘左右皆恶之，以为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？对曰：有老母。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乏。于是，冯驩不复歌。’《史记》以左右恶之，为孟尝君不悦。似误。”[13]凌稚隆不仅通过合理推断，而且借助于互证来辨析《史记》中一些记载不确的内容，这对于《史记》研究而言可谓是有益的借鉴。

4、对前人研究《史记》观点的总结

凌稚隆对《史记·封禅书第六》的研究，引用了杨慎、茅坤、王维桢、唐顺之的评论[14]。对于“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”评点，引有黄洪宪、茅瓒、茅坤、余有丁、王维桢、王世贞、董份、陆瑞家、方孝孺、李光缙、王鏊、王韦、刘辰翁、鲍彪、凌约言、罗大经、张洲、李廷机、高仪、赵恒、黄震、苏子、王安石、何孟春等人的观点[15]。对于“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”的赞语，引有杨慎、柯维骐、王世贞、茅坤、黄震、程敏政对韩信的评价[16]。对于《游侠列传》则引用陈仁子、董份、柯维骐、何良俊、刘辰翁、茅坤的评论[17]。对于《太史公自序》则引用了楼昉、董份、何良俊、许应元、黄震、柯维骐、罗大经的评析[18]。可见凌稚隆编撰《史记评林》所下功夫之大，如其所言“尝博搜群籍，凡考明马史者，辄标识于别额，积草青箱，非一日矣。”[19]其实凌氏在选辑这些评点的过程，也是其研究《史记》的一种体验。

三、《史记评林》的总体评价

在当时研究《史记》者门派分立，各自为是的

①《史记评林》，第2册，卷8，《高祖本纪》，第118-119页。
②汪越《读史记十表》卷10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248册，第667页。
③《史记评林》，第2册，卷9，《吕后本纪》，第164页。
④《史记评林》，第6册，卷123，《大宛列传》，第736页。
⑤《史记》卷52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。
⑥《史记评林》，第6册，卷112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，第403页。
⑦《史记评林》，第6册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，第404-405页。
⑧《史记》卷8，《高祖本纪》。
⑨《汉书》卷1上，《高帝纪第一上》。
⑩《史记评林》，第2册，卷8，《高祖本纪》，第98-99页。
11 冯驩“复弹其剑铗歌曰‘长铗归来乎，无以为家。’左右皆恶之，以为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？对曰：有老母。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乏于是，冯谖不复歌。”（汉高诱注、宋姚宏续注：《战国策》卷11，《齐四》）
12《史记》卷75，《孟尝君列传》载：“五日，孟尝君复问传舍长。舍长答曰：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‘长铗归来乎，无以为家。’孟尝君不悦。”
13《史记》卷75考证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14《史记评林》，第3册，卷28，《封禅书》，第533-535页。
15《史记评林》，第5册，卷86，《刺客列传》，第583-626页。
16《史记评林》，第5册，卷92，《淮阴侯列传》，第788-790页。
17《史记评林》，第6册，卷124，《游侠列传》，第763-766页。
18《史记评林》，第6册，卷130，《太史公自序》，第937-964页。
19《史记评林》，第1册，第124页。

背景下[①]，凌稚隆能汇集众名家的评点于《史记评林》，可见其学术之包容性，且为后世研究汉史学提供了可贵的借鉴。鉴于此，王世贞认为真正能继承和发扬司马氏之学问者，惟有凌氏之《史记评林》[②]。徐中行（1517-1578 年）认为在宋代对《汉书》的研究颇为流行，在明代更注重于对《史记》的研讨，《史记评林》则对当世的“世业”颇有益处[③]，以至于“《评林》行，而自馆署以至郡邑学官，毋不治太史公者矣。”[④]

《史记评林》对明人及后世有关“史记学”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，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：

其一，有益于普及汉史学知识。《史记评林》搜罗历代研究《史记》之名作，且有作者本人的精辟评析，对于普及汉史学的基本知识，弘扬传统文化来说意义颇大。

其二，是后人研究“史记学”的指南。程余庆在《史记集说·序》中言：“迄于有明，说者愈众，凌氏《评林》一编可按也”[⑤]。贺次君则称“凌氏博徵古籍，一一撮而系之，后之学者参互审勘，不劳钩稽群册矣。”[⑥]所以茅坤对《史记评林》的评价——凌稚隆搜集历来对《史记》的注解之书，以及明代自宋濂以下对《史记》有所评点的文字皆录之于内，“兹编也，殆亦渡海之筏矣”[⑦]。

其三，在体例编撰和资料搜集上成为后世典范。《史记评林》不仅对明代的《史记》辑评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[⑧]，而且对日本《史记》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[⑨]，以至“《史记评林》实为明治天皇日课之用本”[⑩]。

其四，为后人研究“史记学”提供了良好的底本。凌稚隆撰写《史记评林》时，对《史记》底本的选择非常慎重。因此，清人钱泰吉在《校史记杂识》中指出“《史记》刻本《集解》、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皆备者，以震泽王氏、莆田柯氏为善。评林本，吴兴凌稚隆刻，藏书家不以为重，今以乾隆四年殿本校勘，乃知胜明监本多矣。”[11]贺次君则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，认为《史记评林》尽管在版本上参考柯维熊本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“往往有胜于柯本及南宋、元、明诸刻者”，因为“凌氏留心校勘，有稗史学良多，后陈仁锡刻《史记评林》，清梁玉绳撰《史记志疑》，皆以此本为依据，故不能以其名为评林而轻视之也。”[12]

当然凌氏之《史记评林》也不是尽善尽美的，由于受明代评点之风的影响，其对《史记》的评点亦有一些主观臆断之处。况且“校刻古籍，必须广求善本，考其异同，然后订其是非，择善而从，方可谓之精审。凌氏于校勘《史记》亦可谓勤而有功者矣，惟其疏于考证，故多不知而误改者”[13]，和“《史》文亦有错脱，或有柯本原误，未及校正者”[14]。但并非程金造在《史记管窥·自叙》中所言：“明人凌稚隆……之书，虽有论太史公作意之言，然零碎、绝无系统，不能窥见其如说荀、孟者，旨归之可指，思想之可据也。”[15]

Analyzing on Ling Zhi-Long's *Shi Chi Ping Lin*

ZHU Zhi-xian

(College of XianNing Humanity College, 437100)

Abstract: Ling Zhi-Long was a Gongsheng(贡生) in Ming Dynasty. He was indulgenced in *Shi Chi*, and compiled Achievements of *Shi Chi* before fourth year in Wan Li period, called *Shi Chi Ping Lin*. This book really overmatches others commenting books, which not only embodies the best feature of *Shi Chi* research during past dynasties, but also permeates Ling's correct and profound insight. This book provides reference in contents \ arrangement \ edition for *Shi Chi* research afterwards. Therefore, we think highly of *Shi Chi Ping Lin*'s historical value.

Key words: Ling Zhi-Long; *Shi Chi Ping Lin*; *Shi Chi* Researched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

①《史记评林·王世贞序》载当时研习《史记》者，“肤立者持门户，皮相者矜影响。彬彬然自谓入龙门之室，而不知其辙，望砥柱之杪而背驰矣。”（第 1 册，第 11 页）

②《史记评林·王世贞序》评道：“今凌以栋先之矣，以栋之为《史记》也，其言则自注释，以至赞骘，其人则自汉以及靖、隆，无所不附载。而时时旁引它子史，以己意撮其胜而为之宣明。盖一发简而瞭然若指掌，……自今而后有能绍明司马氏之统，而称良史至文者，舍以栋奚择哉？”（第 1 册，第 11-13 页）

③《史记评林·徐中行序》。

④王世贞《弇州续稿》卷 42，《史记纂·序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 1282 册，第 560 页。

⑤杨燕起等编《历代名家评〈史记〉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6 年，第 34 页。

⑥贺次君《史记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，第 161 页。

⑦《史记评林·茅坤序》，第 1 册，第 22 页。

⑧张新科、俞樟华《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》，华文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167 页。另，贺次君认为“凌氏此本，于明代末期研究《史记》之影响极大，万历邓以讚本，天启钟伯敬本，崇祯陈仁锡、邹沛德、朱东观等所为评林，悉取资于此。”(《史记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，第 169-170 页)

⑨覃启勋《〈史记〉与日本文化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142-143 页。另外，日本泷川资言在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中，大量引用凌稚隆《史记评林》中的内容作为旁证。

⑩池田四郎次郎《关于史记在我邦的价值》，参见覃启勋《〈史记〉与日本文化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95 页。

11 钱泰吉《甘泉乡人稿》，参见张自然《论梁玉绳的〈史记志疑〉》，《南都学坛》2007 年第 4 期。

12 贺次君《史记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，第 164-167 页。按：梁玉绳在《史记志疑·自序》中言“《史记》刻本甚众，颇有异同，世盛行明吴兴凌稚隆《评林》，所谓湖本也，故据以为说。”（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第 2 页。）由此可见，《史记评林》为后世《史记》研究提供良好的底本。

13 贺次君《史记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，第 167 页。

14 贺次君《史记书录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58 年，第 168 页。

15 程金造《史记管窥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 页。